

山河泪

§ 说给外孙和外孙女的故事

杨先健[※]

1943年那个难忘的夏天。

那是一个晴天，一个初夏的晴天。久雨初晴，太阳里还充满着春光。由于是星期天，这所长沙远郊的中学校园很安静。我正在预习国文老师将在下周一要讲的国文课文《最后一课》，是法国19世纪作家都德 Alphonse Daudet 的一篇小说中译本，描写普法战争时，战败的法国被割让国土的一个小学的学生最后一节法语课的情景。在那国土沦丧，国难当头，举国抗日的年代，我被那个法国小学生和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来学习最后一课法语的老人们，心系祖国文化之情深为感动。下午，校园渐渐热闹起来，回家的同学纷纷返校。同时也带来了惊慌的消息，日本侵略军向长沙进犯了。学上不成了。凌晨，级任曹老师叫我们集合。天很黑。伸手不见五指，看不清人。级任曹教师低声说，日军已离得很近了，马上结伴返家，并说了路上要互相帮助，遇到鬼子兵如何逃命等注意事项。随后曹老师轻声但强有力的地讲了那《最后一课》。老师说：“这恐怕是我给你们讲的最后一课了，也许是你最后听中文课了。你们永远也不要忘记中国文字、中国文化，永远要做中国人。”当曹老师讲到那位法文教师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时，他坚强振臂轻声高呼：“中华民族万岁！”顿

时，老师同学都哭了。我们都是十三、十四岁的孩子，为国土的沦丧，为苦难的祖国和人民而哭、悲愤地流下了山河泪，呜咽着相互道别，嘱珍重。

我回到外婆家，两天后鬼子兵就来了。那天傍晚，在塘边被鬼子兵抓掳作苦力。一个鬼子伤兵的背包很重，压得我直不起腰，就蹲到地上。那伤兵鬼子用枪托猛打我的腰部，我痛苦地爬起来，在鬼子的吼叫声中慢慢地到达驻地。晚上鬼子兵把我和另一个比我大一些的小孩分别用绳索从上身到脚结实捆绑。我第一次失去了做人的自由，第一次遭到如此的侮辱，这是弱小民族受到侵略者的侮辱。这一晚是在恶梦中、在外婆母亲的眼泪中和炮火中度过。第二天鬼子仍用绳索捆着我的腰部。我背了鬼子的炮弹和装备，下雨路滑，身后的鬼子踩了绑我的绳索使我跌倒在地。我真不想爬起来。我这可怜的亡国奴，躺在可怜的祖国土地上、躺在铁蹄下痛苦呻吟的祖国的胸怀里也感到一丝安慰。鬼子兵一手把我提了起来，像抓只鸡一样。就在鬼子兵一把给我提起来那一刹那，我看到鬼子兵抓很多壮年苦力拉着走的重型大炮，竟是一大车大块石和一根粗壮的大杉木，用军帆布盖得严严实实。鬼子军曹发现我看到他们秘密，也很惊慌，我装着无事，但心

※ 杨先健（1929-2010），高级工程师（教授级），1953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为重庆建筑大学）土木工程系。曾任机械工业部第四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教授、兼职博士生导师。国家特许注册结构工程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中高兴起来。日本鬼子不行了，快完了！我心想。我觉得身上有劲了，路也走得稳一些。一路上，道路两旁一片狼籍，远处稻田里躺着一具尸体，着便装，是无辜的死难者。抬头望去，满目凄凉，我心又沉重起来。

中午在枫林港（一条小河）渡口，我们刚摆渡过河，就遇我方美制飞机猛烈轰炸扫射，我周围的鬼子炸死很多。躺在我旁边的鬼子的腿伤了。子弹好象长了眼，我一点未伤，只是满头满身全是泥土。我看到有几十具用白布裹着的尸体，用马驮着，每匹马驮两具尸体，那是他们的长官。还有许多士兵尸体在堤坝上挖了一个大坑焚烧，堤坝上拉着一长块白布，上写日文“十八……”我估计是给炸死的鬼子安魂的话，可能是“十八年后又是好汉”之类。很多马死在田间池塘里无人管。有的还未死，悲伤地望着忙着收尸的鬼子。鬼子们列队行军，都很沮丧。而我却由悲伤变得兴奋，只是不敢表露。原来我们惨遭日本飞机轰炸，现在轮到日本鬼子挨炸了。

晚上鬼子飞机偷偷地飞来投下邮件后溜走了。军曹拿着东京寄来的家信，很高兴。军曹说他曾在上海上过中学，军曹管四个兵，中国话说得很好。在一间已逃跑的主人的卧室里，就只有军曹和我，其他鬼子兵在隔壁屋。军曹读信，靠近阴暗的油灯，我看到军曹眼中含着泪，深沉的思念之情已流露难忍。这时我看到白天作恶的鬼子，也有点人性了。军曹把他妻子与两个儿子的照片给我看。他妻子很漂亮，穿着和服。小儿子依在母亲怀里，大儿子站在母亲身旁，他们那期待而忧伤眼神，令人心碎。我看了这张黑白照片，又想到我的处境，军曹他们受日本军国主义驱使侵略我国，终于也付出了代价。军曹还收到一张唱片，红色软塑料的，那时还以为橡胶的。杂乱的房里有一架破唱机，军曹

放上唱片，发现发条已断无法听而很遗憾。我试着用中指和无名指，轻压着唱片中心处，缓慢旋转，居然发出了唱片的声音，军曹很高兴。隔壁的鬼子也都来听。那天晚上鬼子没有用绳子捆着我睡，以后白天和晚上都未捆我了。

后来到了一个靠近小河渡口的驻地，房子在一个小山包旁，小山包下就是渡口，一条新修的泥泞公路，每天有大量鬼子兵向西边进军。我每天在鬼子兵押解下出来挑水、洗菜、洗碗。趁机了解环境和逃生出路。遍地都有鬼子兵在游动，只是在千多米以外靠近另一山包附近，偶能见到黑色人影，那是中国农民，那就是我计划逃跑的方向。有一天，我坐在屋边的台阶上，旁边没有鬼子兵。我就摸出我口袋里包着一点零钱的那几张《最后一课》，是我回到外婆家被鬼子抓捕前从国文书上撕下的。我看了一遍。又在地上看到半张破碎的《湖南日报》。上面大标题：

“我军在湘北激战后，主动放弃阵地转移。”

我难过极了。他们主动转移，抛下我们老百姓当亡国奴受苦受难。这时我才发现军曹站在我后面。他接过那张破报纸看了看，问我：“你读过书吗？”

我说：“上过初中一年，现在停学了。”

军曹说：“我以前在上海读过中学。”

因为那张旧报的内容，我害怕极了，还不知军曹如何处置我，听他这么说我定心了一点。军曹叫我跟他走。我忐忑不安，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走到一大片稻田边，军曹指着禾苗说：“这水稻缺肥，你将来要学会用科学方法制造肥料，多增产粮食。”

“唉！”军曹深深叹气，眼神沮丧地说：“我们回不了家了，我们的尸骨要在这里做肥料了。”我想起了昨天我方的美制飞机猛

烈轰炸和扫射情景，心中暗自高兴。但又有
点可怜军曹，他们是这场侵略战争的牺牲者。
接着他又指着远方一个不长树林和杂草的
山头说：“你看那山上不长东西，土是红色
的，可能有铁矿。你将来长大了要学知识，
学会开矿、炼钢、制造枪炮。”

军曹一边说话一边拿着手中的三八步
枪比画着，说：“有了枪炮，国家才强盛，
中国太弱了……。”

这时，对面来了一个鬼子兵，向军曹
致意后即走了过去，军曹话峰一转大声说：
“蒋介石死了，汪精卫去东京治病去了，他
脚上有病。”

这些不相关联的话我想是说给那个鬼
子听的，以免他怀疑军曹前面给我说的那些
话吧！我心中是这么想。

听军曹这番话，心中又惊又喜，我可能
遇到同情我们的日本人了。我赶紧向军曹说：
“西山。”鬼子兵要我这样称呼他们，“西山”
可能是“先生”的谐音吧。我常大声叫“西
山”是叫他们日落西山，寓意日本侵略者快
完了。

“那你放我回家吧，我回家就去读书。”
我央求军曹说。

军曹说：“过几天我放你回家，还给你
开个路条，没有路条你走不了的。”我心中
顿时高兴起来。从那以后，我挨打挨骂次数
少了许多。

几天以来我心急如焚地等待军曹给我
开路条放我回家。可是情况却是相反。军曹
不准我随便走动。除了在鬼子押解下做苦力，
无事只能坐在猪圈旁。那也是我晚上睡觉的
地方。军曹不时以凶狠的目光注视着我，凶
狠的目光中还隐藏着杀机，这是以前没有过
的。我还发现，屋后的那张梯子不见了。屋
后是峭壁，那梯子有可能爬上峭壁逃跑，是
我唯一的逃生之路。平时，军曹与山前松荣

（一个列兵）还有另一个鬼子出去，有时也
带我去。现在只允许我与那两个朝鲜兵在家，
并且不许我随便走动。和军曹一起的共有五
个鬼子兵。除三个日本兵外，还有两个我估
计是朝鲜人，因为他们俩受虐待比我还甚，
挨打挨骂次数比我还多。平时军曹从外面回
屋，两个朝鲜兵一边一个跪在军曹脚下，为
他脱皮靴，还给他打水洗脸。他们两个已是
既定的奴隶了。他俩平时很少说话，表面驯
服，但仇恨在心。我可怜我自己，也可怜他
俩。后来我发现那个日本军团里还有不少朝
鲜奴隶兵。他们见到日军军官必须行一种奴
隶礼。有一天傍晚，我看到一个白发军官，
坐在室外饮酒，一桌酒菜他一人享用，有一
个穿粉红色和服的日本女人站着为他斟酒。
那军官很神气，旁若无人，可能是个大官。
一个朝鲜兵经过那儿，不知出了什么错，遭
到那军官训斥。这时又有好几个低级军官，
同时出来，指着那朝鲜兵大骂，并且要惩罚
他。我听不懂他们要如何处置他，但见那朝
鲜兵吓得面如土色，低头哀求宽恕。从那朝
鲜人的细微之处可见到他的屈辱与愤怒。这
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奴役，我的怒火
只能在心底燃烧。我怕殃及，迅速走开。我
想，这会是我的未来吗？我必须早日逃跑，
追寻自由。我想到军曹那次与我的谈话，可
能是试探我的，他已知道我是日本侵略者
的敌人，有抗日思想还有一点文化的危险分
子。他不会真心放我回家的，可能很快要杀
我。我的处境很危险。加之我知道了一些鬼
子兵力（假的重型炮）的秘密，他们是不会
放过我的。我装着老实，心中计划着如何逃
跑。我发现离屋后峭壁不远约2米外有一根
粗毛竹，我想爬到毛竹上面，使劲向峭壁边
摆动就可能爬上峭壁顶部。终于有一天下午，
天阴下毛毛雨，我装着解大便，靠近那根毛
竹。我发现鬼子兵都在躺着，没有注意我。我脱

掉鞋子，迅速爬上竹子，没费劲就爬上了峭壁，山顶上有两个鬼子哨兵，发现了我。跑过来抓我。我想完了！立即躲在一棵小松树下边，眼看着哨兵从我身旁走过。等哨兵走远，我就溜了。游过一条水渠，爬上渠岸，跑过必须穿过的开阔地，到处是鬼子兵。后边追来的鬼子对我开了数枪，我按照老人讲过的，后边鬼子开枪不要直线跑，要歪着扭着跑。老天有眼，子弹都从我头顶和身旁穿过。我终于逃脱了鬼子的追击，爬到对面约两百米处的一丛灌木林地。气喘吁吁坐下来，看到脚上满是荆棘针刺，长的用手拔下，刺在肉里的用木针挑出来，流了不少血，也顾不得了。我看到两个端着枪的鬼子兵，正分两路在包围我，此地不能久留。正想拔腿逃跑，忽然发现一个坟堆上的灌木在摇动，接着露出一个人头，我吓坏了。那人头开始轻声说话：“我看到你跑过来的，这周围到处是日本兵，你很难逃出去。我已在这坟洞里躲了几天了，粮食已吃完，今天吃的是蚯蚓，你赶紧找地方躲起来吧。”他给我指明逃生的方向。他说完又藏入坟洞。我立即爬到一个稍高一点的灌木地，看到追我的那两个日本兵脚步已放慢，探头探脑并未发现我。我一回头，看到约十来米远处一个鬼子，裸身，下身仅扎一个像小孩尿布似的布兜，躺在树荫下的躺椅上，带着眼镜。他看见了我，但仍表现“悠闲”，摇着扇子，并无抓我之意。我干脆走出灌木林，随手拽根狗尾巴草，在手中摇摇地“悠闲”慢慢朝我要逃跑的方向走。不时用脚踢个小石子，好像在逗着玩。以免引起那鬼子对我注意。没走几步，劈面遇到一只日本军用狼狗，它躺在草地上，瞪着眼睛看着我。我吓懵了，那是真正的危险，狼狗比鬼子更厉害，只要那躺着的鬼子吹声哨，我就完了。后有追兵，前有狼狗，我该如何是好？我只好硬着头皮豁出去了，但仍

然“悠闲”地慢慢向前移动。走到离那狼狗一定距离，看清前面无鬼子兵，我撒腿就跑。很快跑出了那灌木林。前面一条大路，稻田里一只日军军马在吃禾苗，对面山上有鬼子哨兵走动。天已渐黑下着小雨，我躲在路旁一个土洞中避雨。心想我终于逃出虎口，但仍处险境，必须小心从事。黑暗中，我看到不远处一个微弱的灯光，心中一亮，仔细观察，那不像鬼子驻军灯光。又听到了轻微的老百姓谈话声。我顺着灯光和谈话声走去，遇见一位妇女和一个小孩，他们在菜地摘菜。我说明来意。他们很同情我，带我回家。那是长沙乡间一幢普通大屋，住有三户人家，那妇女将我向他们介绍，其中一户父女俩正在吃晚饭，他们招呼我过去一起吃饭。那位父亲将他和女儿碗中的两碗米饭均分成三碗，我吃一碗，梅干菜汤。那是我吃的最美的晚餐了，虽然三人都没吃饱。晚上就睡在那父亲房中。第二天凌晨，天不亮，大家起身，准备逃难。那位父亲说，天一亮，日本鬼子兵就进村打劫。下大雨，那位农妇找来一大块防雨油布和一个缺口斗笠给我，并指明我走的方向和避开鬼子兵走小路的走法。我辞别了众乡亲，在黑暗的大雨中摸索着前进。天渐放明，我发现我走的正是我随大股日军以前过过来的大路。路旁还留有那批日军用旧书纸划的红色箭头，压上小石头，还有用小树枝叉架的前进方向标志，为随后来的大部队指明去向的路标。我兴奋极了，全部顺序收起来，然后又朝那三岔路另一方向重新摆好。让鬼子兵贻误军机，给他们添点麻烦。正当我一门心事在摆那些标志时，忽然路边山坡上的树丛中有人叫：“小伢子，快上山来，那里危险！”我抬头才发现天已大亮。那叫我的两个青年农民，其中一个手中提一篮鸡蛋，说是去走亲戚。他们知道我的情况后，要我同他们走，并说走大路是

危险的，很快大批日军要过来了。我跟着他们走山路，穿树林，远处看见零散的鬼子兵在游动。那青年农民说：“附近有抗日游击队活动，听说贺龙的部队来了。这几天鬼子见人就开枪。”这时我想起了那位躲在坟洞里好几天的青年人，还有一天傍晚，那日军军曹在一个山坳里追一个妇女，那妇女直往山坳里跑，军曹紧追不舍，忽然山坳里一阵机枪扫射，军曹掉头就往回跑，而那妇女则消失在山坳里。我回头看了看那两位青年人，他们仔细观察地形，又看看远处的鬼子兵，行动利索，也不像一般种田人。他那篮鸡蛋似乎也很重，我想他们可能是抗日英雄吧！但又不敢问他们。

走了一阵，那提鸡蛋的青年人说：“前面不远是一条小河，枫林港渡口，有日军把守，不能走，你只能走这山下边，但无渡口，可能临时有老百姓结伴过河，你再同他们过去。过了河就是安全地区了”。说完他俩就消失在丛林中。

我下山走到河边，丢个小石子试了水深。河水真不浅，但也不宽，约十余米宽。我跳入水中、轻松地游了过去。我总算是逃出来了！我回头远望日军还驻守的枫林港渡口，那天被我方美制飞机轰炸扫射的渡口，一条装运生石灰的木船还在冒白烟！

抗战胜利后我继续上学。心怀科学救国努力学习。但科学救国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奋斗了几十年，还是落在日本后面。现在日本右翼以及日本政界某些人物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不能轻心。半个多世纪后的一天，在美国 St.louis Mo 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晚宴上，我的邻座是一位年轻日本学者，他风度翩翩，彬彬有礼。他的邻座是一位白发长者，温文尔雅，也是日本人，可能是他的导师。长者在昨天大会的水平报告上，介绍了我的论文。语言简练，而很有份量，着重

指出了我的理论突破了国际权威定论。我们相互致意。

在轻扬的宴会音乐中，会议主席向一千余世界各国学者致词。当他介绍中国代表团在这方面的成就时，在掌声中，我看到我国代表团团长就坐在主席邻座，正在向各国学者微笑致意。中国代表团长的邻座是日本代表团团长席。这种偶然的巧合，使我浮想翩然。算起来，我这是第二次与日本人接触，想到半个多世纪前的日本鬼子兵，和眼前的日本学者，我怎么也无法将二者联系起来。然而他们都是日本人，是确实确实的日本人！

回想到 50 多年前日军军曹在那田间对我这个当时的亡国奴说的那番话，我想：

今天我们不生活在科教兴国的未来。

明天我们就生活在屈辱亡国的过去！

去年我与一位青年专家一同去长沙一家大型汽车厂的高精设备作现场测定。这台高精设备，是保证汽车质量的重要装备，先由一家外商公司精心设计了隔振装置，因不能达标，由我们单位重新设计。当得知测量结果完全满足其高精度要求时，厂项目负责人请我们共进午餐。是去一农家餐馆吃农家饭。其中那梅干酸菜汤，就是我 60 多年前逃出鬼子虎口那晚在那农家父女家吃的晚餐一样美味。吃完饭我走上一个小山台阶，四周似乎有点相识但又陌生。远远望去，河那边的湖边就是我当年被日本侵略军抓掳后走过的地方。那些曾经寸草不生的山头，现在虽是冬季，仍是满目青山。

回头看，八车道的高等级公路望不到尽头。再远看，记忆中的泥泞乡间小路已是笔直的混凝土乡村公路。那稻田说是亩产已超过八百斤。看着眼前的大好河山，想着几十年前的苦难，眼睛模糊了。眼眶中的泪水，洗不尽那六十多年前的辛酸，我那曾经是苦难的祖国啊！

在回城的路上，我寻找着那些过去的痕迹，可怎么也见不到残垣断壁，瓦砾焦土，尸横荒野那些惨不忍睹的半点痕迹。宽阔的街道尽是“火树银花不夜天”，可我那几十

年前的记忆却仍然是历历在目。人老了，记忆没有老，也不能老，忘记过去的苦难就可能招致未来的灾难！民族的灾难！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943年5月杨先健被侵华日军抓捕少年劳工地图